

「雙百」方針1957年被中斷的原因

◎ 羅平漢

1956年4月，為了繁榮中國的文學藝術和推進學術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明確宣布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來貫徹這一方針。遺憾的是，這一方針只實行了一年的時間便被中斷，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遺憾。本文試圖對其中的原因作一點簡要的分析。

原因之一：黨內對「雙百」方針的認識不統一

在「雙百」方針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澤東親筆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最初是毛澤東就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國語文教學研究三個委員會。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

但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個基本的方針完整提出，則是1956年的事情。這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為此召開擴大會議上對此進行討論。會上，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匯報了前一階段文藝界和學術界所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第一次明確地宣布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¹

「雙百」方針提出之後，廣大知識分子以十分興奮的心情對此報以熱烈歡迎。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說：「我們科學界所以衷心地歡迎『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因為『百家爭鳴』是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科學發展的必然道路。」²北京大學教授傅鷹表示：「我們搞科學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贊同『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要科學發展，就應該做到自由論爭，『百家爭鳴』。不這樣，思想就會僵化，科學還哪里會發展。」³

但是，對於在這一政策的看法，在黨的幹部隊伍中，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不少人對此心存懷疑和憂慮。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負責幹部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文章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過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張旗鼓地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

對的中間卻有些界線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誤認為或者利用來反對藝術應為政治服務、藝術要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應作為教育廣大人民的武器的藉口，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鬥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三是自從提出「百花齊放」以後，有許多人只熱衷於翻老箱底，熱衷於走捷徑去改編舊的，甚至有個別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寶貴遺產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圖名求利。

這篇發表後，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少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有的甚至還以編者按的形式贊成陳其通等人的觀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報》在轉載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時，編輯部還在按語中說：「這篇文章提出了當前在文學藝術戰線上貫徹黨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幾個原則性的問題，引起了文藝界及有關方面的廣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遼寧省委文教部召開的文藝編輯座談會曾經討論了這篇文章。與會者一致認為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時的，文章中提出的幾點意見，都是正確的。」這些事實表明，對「雙百」方針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者並非只是個別人。毛澤東也一再說過，高級幹部中不贊成「雙百」方針的是多數，贊成的是少數⁴。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負責人說，「百家爭鳴」缺了共產黨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領導幹部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1956年是唯心論抬頭，唯物論的鳴聲不高，向科學進軍後，知識分子開始鑽研業務了，但尾巴也翹起來了⁵。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信，認為「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攻，說甚麼1955年是無產階級思想向資產階級思想總攻擊的一年，1956年是資產階級思想反攻的一年。資產階級思想獲得了蘇共二十大的援軍，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其具體表現是唯心主義解放了。此人還說，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雙百」方針的報告，除了鼓勵爭鳴外，沒有能解決唯心主義長期存在對人類的禍害問題，因此思想界很混亂，甚麼人的主觀意見都說是「百家爭鳴」。

在那些不贊成「雙百」方針的人看來，「百家爭鳴」中，無產階級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如果讓這九十九比一，「鳴」的結果，很可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甚至是資產階級思想佔了上風。他們還認為，多少年來一直提倡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可是，「百家爭鳴」一來，唯心主義也獲得了「爭鳴」的資格，而他們又認為，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其世界觀本來就是唯心主義的。因此，「百家爭鳴」將會使唯心主義呈日益氾濫之勢，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將變為一句空話，而且隨著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鳴放出來，局面將不可收拾。正因為如此，「雙百」方針提出之後一段時間，「百家爭鳴」的局面並未真正出現。

儘管1957年春毛澤東對為甚麼要實行「雙百」方針作了多次講話，並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開的批評，但黨內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並未真正統一。隨著反右派運動的開展，相當多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將「右派言論」的出籠與「百家爭鳴」聯繫起來，認為都是「百家爭鳴」闖的禍。所以反右派運動後，「雙百」方針作為一句口號還在使用，但實際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

原因之二：對「雙百」方針理解的偏差

1956年大力倡導「雙百」方針一個重要的背景，是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體制的許多弊端，其中包括針對文藝和科學工作的種種清規戒律造成的對知識界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挫傷。黨的領導人在試圖走出一條與蘇聯有所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經濟建設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提出在文學藝術上實行「百花齊放」，在學術研究上提倡「百家爭鳴」。儘管這一政策所允許的對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的寬容，並沒有超過1954年通過的憲法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的規定，但這一政策的提出，與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對文藝的粗暴干涉和對科學研究隨意貼上政治標籤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是對此前片面強調學習蘇聯且一味強調要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變化。

但是，應該看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種提法，雖然在建國之初就已出現，但把它作為意識形態的指導方針，是1956年4、5月間才正式提出的。而這個方針的提出，黨內並沒有進行充分的思想醞釀，沒有通過深入的學習討論，因而也沒有在黨內形成廣泛共識。1955年，在意識形態領域，曾大張旗鼓地進行對胡適派唯心主義的譴責，以及對梁思成建築設計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錯誤」的批判，開展了大規模的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這些運動幾乎涉及到整個知識界。但僅過了半年，「雙百」方針便提出來了，儘管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長期的思維慣性，有相當多的黨員、幹部一時難以轉過彎來，對實行這一方針抱有某種抵觸情緒。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種批判運動而顛顛驚驚、謹小慎微的知識分子，也對此心存疑慮而不敢大膽「爭鳴」。河北天津師範學院院長胡毅說：「百家爭鳴是執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的一種手段。我相信今後大家對百家爭鳴的顧慮會減少，但不見得會很快就全沒有。」南開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鄭天挺說：「一年來，可以說歷史科學界已經爭鳴起來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報的社論都提到這一點。但照我們的看法，鳴是鳴了，而比起哲學、文藝方面來說，鳴得還不夠，差得很多。可以說還有顧慮。」⁶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潘世茲則更是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一次提出鳴放的方針，大家都很興奮。不過有這樣一種疑慮：今天我把甚麼話都講出來，過一個時期，一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是要算賬？不光我一個人有這種想法，我所接觸的一部分人也有這種想法。有的朋友談起整風，不知道我們是否要弄在裏頭？還有人懷疑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一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⁷

「雙百」方針提出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想「放」而不敢放，想「鳴」而不敢鳴的局面，正如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的：「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象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意味著他們的積極性是動起來了，特別表現在提高業務的要求上，但是消極因素還是很多的。他們對百家爭鳴還是顧慮重重，不敢鳴，不敢爭；至於和實際政治關係比較密切的問題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神氣。」⁸針對這種情況後，黨內又產生了急於想改變這種局面的情緒。恰好在此時，中共中央決定開展一場廣泛的整風運動，以改進幹部作風。到了這時，人們對於「雙百」方針的貫徹變成了千方百計勸導知識分子參與「爭鳴」，並且將這種「爭鳴」轉變為動員知識分子參加整風運動的一種方式，甚至還搞起所謂「大鳴大放」。所以從這時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雖然再度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放」與「鳴」的重點，已不是文藝與學術思想問題，而是鼓勵黨外人士「鳴放」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點。

到此時，不論知識分子還是政策的詮釋者，對「雙百」方針的理解都出現了偏差。當初這個方針提出的時候，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是「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學術方面的百家爭

鳴」，這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限定的範圍是十分清楚的。至於在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之外的領域，事實上是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堅持甚麼樣的政治制度，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從來沒有必要進行「爭鳴」。可是，1957年整風運動之後，卻將「百家爭鳴」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向執政黨的工作和執政黨的幹部提意見，這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上的「爭鳴」了，從而也就偏離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本意。「放」與「鳴」的結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鳴」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於對形勢作了脫離實際的判斷，隨後發生了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這樣一來，「雙百」方針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極影響

在探討「雙百」方針在1957年的歷史命運時，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這年10月，社會主義陣營的匈牙利發生大規模的群眾性示威遊行，提出反政府的口號，隨後又演變為大規模的騷亂和流血衝突，後來由於蘇軍進駐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事件才得以不息。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是甚為震驚的，同時也使他產生了一種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的重演。

當時，毛澤東一方面曾自信地說：「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⁹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擔心中國會不會出現類似情況的問題，而且要設法避免匈牙利這類事件在中國發生。尤其是在1956年下半年，中國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現象，城市有少數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農村也發生了一些農業合作社的社員鬧退社的事件，更是增加了毛澤東的這種擔心。1957年1月的省市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按：指此時國內少數鬧事的人）引出了洞。」¹⁰他還說：「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¹¹毛澤東又說：「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醜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¹²

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此時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半年前他對「雙百」方針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他倡導這一方針的主旨，是繁榮文學藝術和推進學術研究。匈牙利事件後，雖然他仍有同樣的用意，但還有一層用意，就是讓那些「毒草」長出來，讓「牛鬼蛇神」跳出來。他甚至說：「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¹³

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後開始考慮的，而一旦形成，他就親自執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¹⁴不過筆者認為，1956年10月開始的「引」的策略，與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決策，在本質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引」更多的是樹立對立面，使「香花」與「毒草」進行比較，從而使人們能夠辨明甚

麼是「毒草」，並最終自覺地與「毒草」劃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長。整風運動之前，在毛澤東看來，我們的社會裏，雖然存在著「毒草」，雖然有一些放「毒屁」的人，雖然有人不贊成社會主義，但這是少數，通過實行「雙百」方針，讓他們跳出來，使人民認清他們的面貌，從而孤立他們。他覺得有那麼一些「毒草」並不可怕，到時把它鋤掉就是了。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巨大勝利，毛澤東的心情自然是十分興奮的，他並沒有把社會上還存在一些「毒草」看成有多麼嚴重，甚至認為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也值不得大驚小怪。不然的話，他就沒有必要在1957春一再號召並大力提倡「雙百」方針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風開始後，鼓勵「大鳴大放」的結果，放出來的「毒草」卻大大超過了黨的領導人的預料，這才使他們感覺到「事情正在起變化」，需要來一場大規模的鋤「毒草」運動，才能將問題解決。為了將「毒草」除盡，尤其是將那些隱藏較深的「毒草」除掉，毛澤東一面在黨內布置反擊，一面指示繼續「鳴放」，繼續讓那些「毒草」長出，讓「牛鬼蛇神」自動跳出，目的當然是為了屆時聚而殲之。如果說，1956年毛澤東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種政策來提倡，那麼，匈牙利事件後就有政策與策略並重的意味了，甚至後者更主要一些。至於在作出反右派運動的決策後，繼續鼓勵「鳴放」毫無疑問僅是一種策略了。到了這個時候，真正意義上的「雙百」方針中止也就並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對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的變化缺乏足夠的估計

1956年知識分子政策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在這年1月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團結、教育、改造舊知識分子的同時，黨又用了很大的力量來培養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由於這一切，中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¹⁵。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單單是一個稱號問題，更主要的是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的一種認同。

但是，在隨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並沒有使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提法，而是說：「在黨的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年來各方面的偉大變革和偉大成就的強烈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已經形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¹⁶這就說明，黨內當時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認識並不一致，有人認為知識分子並未改造好，還不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中國的政治用語中，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是有層次上的區別的，無產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勞動人民從整體上講是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的。反右派運動前，毛澤東一方面不斷地強調要堅持「雙百」方針，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談到黨的歷史經驗時，這樣說：「在整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時期內，我們要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使他們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後，在一定時期還要和他們保持聯盟。這樣做，有利於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利於發展生產、穩定市場，有利於爭取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¹⁷1957年3月，毛澤東在文藝界代表談話時，又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若論出身，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反動起來，也很厲害。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變革命，我也是算在這個範疇之內的。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

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有的人後來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¹⁸

毛澤東之所以將知識分子冠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在他看來，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了腳跟，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大概只佔百分之十幾，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處在一種中間的狀態。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復強調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重要性，說知識分子中的多數人，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完全代替資產階級世界觀，還相差很遠。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是並沒有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裏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認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學習了，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分子，那就錯誤了¹⁹。

這種估計，不但與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知識界的實際情況。正是由於認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他們的政治立場還沒有站到無產階級這一邊，因此，需要繼續加強對他們的改造。對知識分子的狀態的過低估計，必然導致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認為知識分子仍屬改造對象，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參與「爭鳴」，這就難免將他們看作是「百家」中的資產階級成員，在潛意識裏認為他們「鳴」出來的東西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整風運動後「右派言論」的出現，似乎更是應證了原來的判斷：知識分子果真沒有改造好，果然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說，在反右派運動的準備階段，為了「引蛇而洞」，讓各種「毒草」長出，讓「牛鬼蛇神」自動跳出，「百家爭鳴」作為一種策略還在使用的話，到了正式反右之後，自然就不能讓其出來毒害民眾了，「百家爭鳴」當然也就不能再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份。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齊放」就變成了一枝獨秀，「百家爭鳴」也就變成了一家獨鳴。這種局面，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改變。

註釋

- 1 毛澤東：《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 2 《科學家、教授談「百家爭鳴」》，《光明日報》，1956年5月25日。
- 3 《科學家、教授談「百家爭鳴」》，《光明日報》，1956年5月28日。
- 4 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
- 5 《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頁、第259頁。
- 6 《天津的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座談》，《人民日報》，1957年4月21日、22日。
- 7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改善黨群關係》，《光明日報》1957年5月10日。
- 8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 9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頁。
- 1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8頁。

- 11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8頁。
- 12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6頁。
- 13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5頁。
- 14 段躍編：《烏「晝」啼——1957年「鳴放期間雜文小品文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 15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3頁。
- 1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34頁。
- 17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 18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2頁。
- 19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1頁。

羅平漢 男，1963年生，湖南省安化縣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三期 2005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三期（2005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